



THE SYMPOSIUM OF

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015)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文 集

(2015)

主 编 / 李安山

副主编 / 毕健康 巨永明

THE SYMPOSIUM OF

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015)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文集

主编 / 李文田
副主编 / 毕健康 巨永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文集. 2015 / 李安山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9
ISBN 978 - 7 - 5097 - 9595 - 8

I . ①中… II . ①李… III. ①非洲 - 历史 - 文集
IV. ①K4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653 号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文集 (2015)

主 编 / 李安山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郭红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37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595 - 8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李安山

2012 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在江苏师范大学开会时，出现三所大学竞争召开 2013 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年会的场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竞相表示希望承办 2013 年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年会。三所学校各有特点。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长期以来为非洲培训了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但从未与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有过合作办会的经历；河南师范大学代表着文化历史厚重的中原地区，也从未与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合作办过会；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近年来进展很快，也有长期从事非洲教育研究的传统。考虑到各种因素，特别是 2013 年为非统/非盟 50 周年纪念，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新成立了非盟研究中心，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会决定 2013 年的年会在天津召开。2013 年年会有三个特点：一是年会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与中国其他四个相关学术机构（中国亚非学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和中国中东学会）一起合办，具有特殊意义；二是会议与文化部的“挺嘎挺嘎非洲绘画展”同时举办，在非洲文化宣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三是邀请了一些非洲外交官和埃塞俄比亚学者参会。会后出版了由翟凤杰、王玉华和潘良主编的《非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中非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在天津召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会之前，浙江师范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又一次表达了承办 2014 年年会的愿望。我只好事先与专程来天津争取承办权的河南师范大学巨永明教授交换意见，他高风亮节，再次相让。这样，理事会一致同意浙江师范大学承办 2014 年的年会。2014 年年会暨“非洲与外部

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研讨会”于4月19~20日在浙江师范大学成功召开。刘云、周海金和马恩瑜主编的《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论文集于201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17~18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中国与非洲：发展战略的对接与交融”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办，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西亚非洲》编辑部共同承办，共有来自国家部委、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其中有46人提交论文并发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文集（2015）》主要在这些论文中精心挑选汇集而成。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会同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各位会员的支持。互相尊重、团结一致，这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一直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并逐渐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全国高校对非洲研究的热情提升，除了教育部指定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培育基地和外交部非洲司正在完善的“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涉及的研究机构外，不少高校也在全力推进非洲研究。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非洲农业与资源研究、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非洲法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东非地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非洲民族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的援非减贫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非洲语言文化研究、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非盟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的非洲新闻研究都在稳步推进。此外，外交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的非洲研究中心也努力跟进，各具特色。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异军突起，这要归功于学校领导的高瞻远瞩，非洲研究院和中非商学院各位同人的努力以及相关部委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同人的支持。当然，中国崛起与中非合作的大环境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机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的发展为其他高校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同时，中国的非洲研究日益引起国际上的注意。除了我们各自单位每年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以及正常的国际交流外，国外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非洲研究。2013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来函，任命我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9卷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共有17名成员，9名来自非洲大陆，另外8名分别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古巴、

巴西（2名）、巴巴多斯和中国。我是亚洲国家的唯一代表。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又被大家选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2013年6月，德国外交部举办“中国、印度与德国在东非地区的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邀请了钟建华大使、沐涛教授、王洪一先生等几位中国学者和我参会。非洲驻华使团举办的非统/非盟50周年庆典也邀请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要负责人杨立华和我做主题演讲。很明显，中国学者的非洲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中非智库论坛引起了国外关注，一些有关非洲的中文著述被外国人译成外文出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网站、非洲研究丛书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北大非洲电讯》吸引了不少国际学者，国外对中国非洲研究的报道日益增多。

虽然中国的非洲研究有其特点，但中国非洲研究的落后现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在国外学习非洲史七年，回国后一直关注国际上的非洲研究，对这一点深有感受。2014年，我向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员转发了2014年英国非洲研究会议的大纲，收到不少反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时任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商学院院长刘贵今大使在看完长达76页的大纲后给我来信，深有感触地指出了英国的非洲研究学术积累深厚，中国的非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非洲研究的落后状态与近代西方学科建设、学术话语和学术地位的确立及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有直接联系，同时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和非洲关系的特点有关。可以这样说，非洲的历史演进和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紧密相连。从达尔文提出“我们早期的祖先更可能是生活在非洲”这一预言起，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即其他地区的人类很可能来自非洲。而且，非洲在早期历史演进中自成一体，并在各个历史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欧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非洲文化惠及外部世界。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扩张，北美印第安人文化几乎被尽数剿灭，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几乎全部丧失。然而，非洲在近代奴隶贸易的摧残、资本主义的发展、种族主义的蔑视与帝国主义的瓜分和殖民主义统治过程中如凤凰般浴火重生，以其特有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化转入外部世界，在艺术、雕塑、音乐、舞蹈、价值观和生命力方面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力充分说明了非洲文化的承受力、包容力以及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不能忽

视的。

从历史上看，虽然早期中非有零星交往，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洲的关系远远走在中非关系之前，并占有多重优势。第一，欧美和非洲在奴隶贸易时期建立的不平等关系与西方大国在殖民主义时期在非洲确立统治地位的影响至深且远。非洲国家独立后，前殖民宗主国迅速调整与非洲的关系，英国与法国等原宗主国建立的英联邦、法兰西共同体以及随后与非洲确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使西方在非洲的特殊地位得以维持。2014年4月召开的欧盟—非洲会议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关系。第二，22个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加上21个非洲法语国家和5个非洲葡语国家，原宗主国的语言不仅为西方文化在非洲建立其优势地位提供了各种便利，也在学术上占尽优势。这一点我们目前难以超越。第三，非洲后裔和非洲移民占美国人口的12%左右，英、法的非洲或黑人后裔占其人口的比例达6%左右。这种血缘上的联系无疑是西方国家的重要优势。第四，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政治制度对非洲的影响是西方国家的一大优势。第五，地理位置的优势使欧洲大陆与非洲的接触更加便利。历史联系、语言文化、人口构成、制度影响、学术话语和地理位置等多重优势使西方的非洲研究走在前面，这是我们暂时无法跨越的客观现实。中国在与非洲交往过程中的优势在于坚守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这一点是我们的特点，应该为我们研究非洲提供一种独特视角和优越条件。我们在一步步地追赶，但必须脚踏实地。

作为中国研究非洲的学者，我们首先得承认，自己还要下功夫，既要加强对策研究，更要加强基础研究，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现在，研究经费有所增加，出国访问的机会相对增多，国际交流的活动日益频繁。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多个非洲国家。非洲学者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当然，不少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员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集合体，一方面会全力支持各相关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提供各种信息为大家服务，另一方面将继续做好在非洲研究方面的协调工作。换届以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得到了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副会长兼秘书长毕健康研究员在学会秘书处的运作方面贡献良多，副秘书长潘华琼博士为学会网站顺利运作费

力不少，其他学会领导也从各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正在组织会员抓紧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世界历史卷非洲史分卷条目的撰写工作。

这些年来非洲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一批青年学者的出席以及他们展示的研究成果。这些青年学者是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未来，他们功底比我们扎实，视野比我们宽阔，外语能力比我们强。然而，要赶超西方国家的非洲研究，任重而道远。要真正搞好非洲研究，我想向青年学者提五点希望。一是树立持之以恒长期研究的思想准备。非洲研究虽然在我国起点较低，似乎也比较容易出成果，但要研究出能经受历史考验的成果不容易，它既需要长期对学术的关注与钻研，也需要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观察与分析。二是应将人文关怀、国家需求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结合。一个人的研究生涯如果能与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相结合，其研究的立意更高、角度更宽、视野更远。三是应该树立认真踏实的研究精神，“咬住青山不放松”（叶剑英元帅语）。现在的研究条件远比以前好，但诱惑很多。扎实的功夫来自对材料的阅读与消化以及实地调研。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向老一辈学习，如多次出席年会的宁骚、顾章义、张象、许永璋等教授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四是应重视外语学习。我们搞涉外研究（世界史、国际问题、民族学、外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等），只有更好地掌握外语，才能更好地与人沟通。目前，一些学校加强了非洲语言的教学和训练，有志于研究非洲的青年学者应掌握更多的外语。目前，中国在国外留学的研究生中有的在学加纳的特维语，有的在学南非的祖鲁语。国内的学校也在拓展非洲语言的教学与科研。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课程；2014年5月第一届中国非洲语言文化教学科研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些都表明中国学者正在加强非洲语言的学习与研究。五是应该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非洲学者的交流，这一点不言而喻。对既定的研究议题、形成的话语和流行的论点要先熟悉，再提出质疑，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些年，“中国—非洲智库论坛”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与非洲学术界发表意见的舞台。中国学者也开始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或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中国的崛起与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为非洲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充分利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一直鼓励各校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非洲研究。2013年6月，德国外交部召开的“中国、印度和德国在东非地区的未来展望”的会议为何邀请沐涛教授呢？我想，主要原因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重点在于东非地区研究。同样，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为何能在中非法律合作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研究有重点。外交部非洲司为何在马里局势出现乱局时要请北京大学的潘华琼老师去讲马里问题呢？因为她学有所长。目前，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开始着重非洲经济研究，先后出版《非洲经济评论》和《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南京大学着重研究非洲经济地理和农业资源问题，已经出版了“非洲资源开发与中非能源合作安全研究丛书”；天津职业师范大学以非洲联盟为研究突破口；华东师范大学将重点放在东非地区。这些都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研究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专家，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马上可以推荐某校的某教授，这时中国的非洲研究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理想的境界。我仍然记得，1994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成回国后，参加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一次学术研讨时，我提出各个高校最好选中一个国家，坚持数年，在资料收集、人才培养和科研教学上重点攻关。这一建议的提出已有20多年。我今天仍然衷心希望，中国的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甚至各位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研究集中在非洲某一国家或某一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坚持数年，中国的非洲研究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相信，只要中国学者能以人文关怀和国家需要为宗旨，以学术研究为指导，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非洲研究与中非关系研究并重、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重，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中国的非洲研究将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李安山

目 录

序 言 李安山 / 001

非洲历史与文化

古代中国人移居西非内地的探讨

——试解一个历史之谜 许永璋 / 003

东非沿海发现的龙泉瓷器补阙 丁 雨 / 015

非洲文化的包容力与“非洲性”的当代解读

——读《非洲的生活哲学》有感 李安山 / 029

重构非洲史的知识形态

——美国非洲史学者保罗·兰道访谈录

保罗·兰道 笔谈 王延庆 采访与编译 / 034

非洲艺术研究与中国非洲艺术品馆藏现状 王少波 / 043

非洲政治

尼日利亚 2015 年大选观察及思考 李文刚 / 059

武装组织的规范学习

——以布隆迪武装组织学习儿童兵规范为例 颜 琳 / 071

当代埃及教育发展与社会流动问题评析 毕健康 陈 勇 / 096

埃及军政分歧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朱泉钢 / 110

非洲民族与宗教

应对民族多样性的“非洲思路”

——“多维度”视域下的埃塞俄比亚民族治理模式 施琳 / 125
非洲政治伊斯兰

——聚焦撒哈拉以南非洲 李维建 / 143

非洲与世界

当前中美对非洲的政策及其比较 乔旋 李广一 / 161

21世纪欧盟对非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与非洲

《2063年议程》 刘青建 赵雅婷 / 172
中国参与苏丹事务的历史考察 王猛 / 186
马拉维对华关系的转型：1964~2015年 武涛 / 204
中国非洲研究的再思考 张象 / 221
中非产能合作：现状、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 刘青海 / 227
东非媒体视域下的中非产业合作现状评析

——以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报刊媒体为例 倪小龙 / 240
中国与非洲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初探 曾爱平 / 252

青年论坛

浅析坦桑尼亚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现代挑战 陈金龙 / 277

索马里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和特征探析 陈利宽 陈丽蓉 / 295

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的新特点及原因分析 刘均 / 310

中国与南苏丹关系发展研究 毛锐 / 322

后记 毕健康 巨永明 / 337

非洲历史与文化



古代中国人移居西非内地的探讨

——试解一个历史之谜

许永璋*

【内容提要】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比隆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本文认为，在古代，可能有一批中国人曾到达这个地区并且定居下来。本文从前提条件、移居路线追踪、非洲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通往内陆的道路等方面，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尼日利亚比隆人 古代中国人 撒哈拉商道 索法拉商道

古代中非关系史中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史料缺乏，这些问题尚未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目前，关于古代中国与非洲的联系，仅限于与北非和东非的联系，有少量文章提到同南部非洲的联系。但是，古代中国与西非是否有联系？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为此，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试图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即古代中国与西非的关联问题。

一 一个有趣的历史之谜

古代中国人是否到达非洲西部地区？或者说，古代中国文化是否传播至

* 许永璋，笔名楚汉，1935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

西非？如果没有中国人到达西非，那么古代中国文化也就不可能传播至西非。因此，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不过，中国人究竟何时到达西非以及怎样到达西非？一直未能得出有根据的回答。这里，仅举一个与此有关的历史之谜。为了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历史之谜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有位中国学者曾到西非访问，并到达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高原州。他受到该州首府焦斯^①市长的热情接待，并同几位历史学者座谈。

当地生活着比隆族^②。比隆族同中国人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兄弟”。

在外貌方面，比隆人与身材高大的非洲人不一样，个子不高，很像东方人。特别是和中国人相比，除了皮肤和头发之外，比隆人的体型和脸部轮廓都与中国人很相像。

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当地语言的发音和含义与汉语相同。例如，比隆人把专门用来喝稀饭的圆形陶制或搪瓷器皿叫作 wǎn，和汉语中的“碗”字的发音一样；把喝酒的小杯子叫作 zhōng，和汉语的“盅”字发音一样。还有很多，如称盖房子的木椽为“梁”(liang)，称父亲为“大”(da)，对酋长、首领和长者尊称为“公”(gwom)。

在姓氏方面，比隆人与尼日利亚的其他各族不一样，却同中国人一样，如潘(Pam)、庄(Chwang)、江(Jang)、王(Rwang)、张(Zang)、冯(Fom)，其发音都同中国人的姓氏一样，并且单字姓多，复姓少，世世代代继承一个家族的姓。

在生活习惯方面，比隆人与尼日利亚其他民族不同，却与中国相似。他们喜爱吃蔬菜，尼日利亚其他各族大多不爱吃蔬菜，而是吃牛羊肉比较多。比隆人喜欢喝酒，并食用猪肉。他们或喝酒表示喜庆，或借酒消愁，这和尼日利亚北方的伊斯兰教徒是不一样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比隆人已有人成为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但大

^① 或译作“乔斯”。

^② Birom，比罗姆人。

多数还是信奉传统的宗教，信奉鬼神精灵，相信人死之后还有阴魂，因此有用食物或牲畜祭祀的习惯。^①

像这样相同或者相似之处还有很多。总之，从比隆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同中国人相同或相似之处。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历史之谜，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极大的兴趣，使我们对比隆人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有何联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 大胆的推测和猜想

中国与尼日利亚相距万水千山，为什么尼日利亚的比隆人和中国人却有如此之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呢？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探讨古代中国文化与比隆人文化之间的联系，必须考虑到，在历史上的某段时期，曾经有一批中国人到达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经过若干世代的发展，虽然他们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仍然保留着往日的某些痕迹。

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传承性是相当顽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一经产生，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② 这就是说，理论上尼日利亚比隆人文化中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上述实际情况看，比隆人和中国人似乎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正是根据这种推测，笔者大胆做出这样的猜想：中国人在历史上的某段时期曾经到达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他们带去了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虽然他们已成为当地居民的组成部分，即成为比隆人（这个族

^① 钟国岭：《中国文化和比隆人文化关系之谜》，《世界民族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1页。

名因何而形成，也需探索），可是岁月仍然未能完全抹去古代中国人的某些痕迹。

那么，古代中国人何时并且怎样到达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这就需要用历史事实加以证明。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探索下去。

三 古代中国人到达非洲的前提条件

古代中国人能否到达非洲的尼日利亚，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否有一条从中国到达非洲的道路（包括陆路和海路）；古代中国人是否具有到达非洲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从历史上看，这两个条件是具备的。

先看第一个条件。从中国通往非洲的道路是存在的。早在西汉时期，就开通了一条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来有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某些信息。《史记》和《汉书》记载的“黎轩”“犁轩”“犁靬”，均系埃及 Alexandria 的简略音译，即亚历山大城。据这两部古籍记载，西汉王朝曾遣使“黎轩”，以及黎轩“善眩人”曾来到中国。^① 可见，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

东汉时期，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虽然未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公元 120 年（汉安帝永宁元年），有埃及杂技艺人来到洛阳。特别是公元 166 年（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遣使访华，进一步将埃及亚历山大城与中国的洛阳联系起来。不过，这两次大秦使者访华，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②

西汉时期，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即中国通往西方的南海商路。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某种原因常常受阻，海上丝绸之路却一直在发展和延伸。从中国方面说，西汉时就有海船从雷州半岛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沿海岸航行，到达印度南部。从非洲方面说，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以前，埃及商船就已经到达印度。于是，以印度为中间站，南海丝绸之路

^① 许永璋：《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考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41 页。

^② 许永璋：《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考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211 ~ 213 页。